

# 被閹割的使者

## ——評《持燈的使者》兼談文學史料的編撰問題

● 李章斌

《持燈的使者》中大部分文章都被或多或少地刪改且無任何說明，這些被刪改的內容關係到我們對中國地下詩歌運動的理解是否深入、全面，而且大陸的研究者很可能對這些被「閹割」的史料不加思考地引述，以訛傳訛。



劉禾編：《持燈的使者》（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劉禾教授所編的《持燈的使者》自2001年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後，就引起了學界的注意。惜乎中國大陸與海外出版市場的阻隔，一般的大陸讀者

難以讀到此書。而大陸版《持燈的使者》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於2009年出版（亦為劉禾編，以下簡稱《持燈》，除了特別說明者以外，均指大陸版的《持燈》，引用只註頁碼），筆者原以為一本史料價值極高的中國地下詩歌資料集是頗可期待的。關於「白洋淀」、「今天」等詩群的中國地下詩歌運動所經歷的曲折歷史，1999年在大陸幾經周折方得以出版的《沉淪的聖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已有詳盡的史料和回憶文章<sup>①</sup>，中國當代詩歌所走過的曲折路程可以窺得一豹。而這本十年後在大陸繼之而起且由海外學者編撰的《持燈》，本應更勝一籌。然而，在詳細的閱讀和比較之後，筆者發現該書所收錄之文章不僅全部都已在海外的刊物（如《今天》、《傾向：文學人文季刊》等）刊載過，而且相當一部分文章也已經收入到《沉淪的聖殿》中（《持燈》所收24篇文章中有15篇已經收入到《沉淪的聖殿》）。

更重要的是，《持燈》中大部分文章都被或多或少地刪改且無任何

說明——而且刪改之後依然文從字順，不認真核對原版本幾乎察覺不出來。筆者認為這些被刪改的內容關係到我們對中國地下詩歌運動的理解是否深入、全面，而且由於目前大陸出版的關於這方面的資料集仍然很少，再加上該書的香港版已經具有較高的聲譽，大陸的研究者很可能對這些被「閹割」的史料不加思考地引述，以訛傳訛。因此，筆者謹將其不當刪改之處予以指出並討論，以供讀者參考。

一

《持燈》一書所收入的〈芒克訪談錄〉是關於《今天》雜誌創刊始末的一篇很重要的訪談。芒克是當代著名詩人，且為《今天》的創辦者和核心之一，而訪談者唐曉渡也是對中國當代詩歌有深入了解的學者和批評家，訪談的權威性不言而喻。可惜的是，這個訪談有相當一部分關鍵內容被刪改。請看這段話（T為唐曉渡，M為芒克）：

T：聽起來像是一段傳奇。據說第一期和第二期中間編輯部曾發生過分裂，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M：起因是參加一次民刊聯席會議，是在陳旅家。我和北島都沒在，是黃銳去的……（頁237。本文引文中的省略號除特別說明者以外，均為筆者所加。）

實際上，此文刊載於海外《傾向》雜誌時，芒克是這樣回答的②：

起因是79年初，有風聲說上面要取締民刊，於是「七大民刊」的負責人開了一個聯席會議商量對策。

所謂「七大民刊」是指當時北京名頭比較響亮的七家民間刊物，包括《今天》、《四五論壇》、《沃土》、《北京之春》、《人權同盟》、《探索》和《啟蒙》。《啟蒙》的本部在貴陽，是黃翔他們搞的，但在北京有一個分支，負責人秦小春。其他的負責人分別有徐文立、劉青（《四五論壇》），魏京生、楊光、路林（《探索》），任曉町、陳旅（《人權同盟》），胡平（《沃土》），王軍濤、陳子明、劉迪（《北京之春》）等。聯席會議通常在東四十四條76號劉念春家裏開。《今天》的編輯部當時就設在76號。劉青也住在那裏。他是劉念春的哥哥。

但那次是在陳旅家。我和北島都沒在，是黃銳去的……

可以看到《持燈》的版本刪去了大段內容，而且還進行了字句改動，以使前後連貫。這幾段話說的是《今天》編輯部的分裂問題，起因是編輯部成員參加了一次和民刊有關的活動。但是，從《持燈》的版本來看，我們不知道這次活動具體是關於甚麼的，又有哪些別的民刊參與了，所以「究竟是怎麼回事」依然無法得知。讀到《傾向》中的版本，我們才得知原因是政府要取締民刊，而這些刊物除了《今天》之外，全都是政治色彩濃厚的民運刊物，《今天》參加「聯席會議」目的便是要協商一致與政府抗衡，部分編輯部成員不同意參與政治運動因而退出《今天》。

《持燈》的〈芒克訪談錄〉刪去了大段內容，而且還進行了字句改動，以使前後連貫。這幾段話說的是《今天》編輯部的分裂問題和起因。從《持燈》的版本來看，我們不知道這次和民刊有關的活動具體是關於甚麼的，又有哪些別的民刊參與了。



《今天》書影

《今天》與同時期的政論性刊物之間同氣相連的關係，以及其本身的政治反叛色彩，在它和《四五論壇》聯合發起的抗議政府取締「星星畫展」遊行事件中體現得更為明顯。《持燈》所收錄的文章本來有這方面的詳細的內容，可惜都被處理掉了。

《持燈》如此處理內容當然是因為芒克提到了多位民運人士與多家政論刊物，然而這直接影響到讀者對《今天》與當時的政治運動之關係的理解，也影響到讀者對《今天》雜誌乃至「今天」詩人之性質的理解。「七大民刊」與「西單民主牆」幾乎同時出現，而且以後者為重要的傳播途徑：這些刊物編好之後，往往會張貼於民主牆等地供群眾閱讀。作為「七大民刊」中唯一的以文學作品為主的刊物，《今天》自誕生之日起就與其他刊物和團體相互作用和影響。尤其是黃翔領導的兼具政治與文學色彩的《啟蒙》雜誌，對1978年《今天》的誕生起到了直接的刺激作用。

北島曾在一次訪談中提到黃翔對他的影響（這個訪談也收入到了《持燈》，頁227-33裏）<sup>③</sup>：

可是真正到1978年的時候，突然政治氣候轉變了。我記得一個轉變的最重要的迹象，就是1978年10月11號，在王府井大街貼出了黃翔和

幾個貴州的年輕人的詩。這段歷史很容易被人遺忘。實際上他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雖他們的詩是非常政治性的。我現在不必評論他們的作品了，就是說當時他們這種「狂妄」態度，對北京人來說可以是呼嘯而來，所以，對我們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這段話在《持燈》香港版和大陸版都被去掉了，非常可惜。關於黃翔的《啟蒙》和《今天》的關係，且不論海外，國內學者亦有論述，已經不是甚麼秘密了<sup>④</sup>，而海外學者在出版資料集時卻如此「自覺」地對材料進行處理，實在匪夷所思。

《今天》與同時期的政論性刊物之間同氣相連的關係，以及其本身的政治反叛色彩，在它和《四五論壇》聯合發起的抗議政府取締「星星畫展」遊行事件中體現得更為明顯。《持燈》所收錄的文章本來有這方面的詳細的內容，可惜都被處理掉了。芒克回憶到：

還有一次大的活動，即抗議第一次「星星畫展」被取締，時值三十周年大慶前夕。這次抗議活動和聲援是《今天》和《四五論壇》共同發起的。也是在76號開的會，會後以三家的名義給北京市委去了信，要求答覆，期限定在9月30日午夜前，否則就遊行。

結果政府並未答覆，北島、芒克、劉青、徐文立等遂組織遊行：

到點大家全部集合在民主牆下。一到那裏就被圍得水洩不通，

我們臨時在一個土台上擱了一張板凳開始演講，先後有馬德升、黃銳、徐文立等。公開信是我宣讀的，讀完後馬上出發向天安門方向遊行。王克平和另一個人在前面打着橫幅，馬德升走在中間；我們身後浩浩蕩蕩跟着成千上萬人，很是壯觀。快到府右街時兩邊突然衝出大批警察，白花花的一片分布成幾道防線。一見這架勢那些跟着的人紛紛後撤到離我們幾十米的地方，有開溜的，有上樹的，把我們幾十個人晾在了前面。

徐文立上去交涉。對方說奉上級命令不許通過天安門，必須按照他們指定的路線走。我們同意了，於是右拐從現在的音樂廳經和平門、前三門，再右拐到北京市委，把市委大院坐得滿滿的。北島、徐文立、黃銳進去交抗議信，我、劉青、王克平在外面組織演講。後來上面接受了抗議信，北島他們出來，我們才宣布遊行結束⑤。

以上回憶在《持燈》中均被刪除，只留下兩句無關痛癢的話：「還有一次大的活動，即關於第一次『星星畫展』。這次活動是《今天》和《四五論壇》共同發起的……」（頁240，省略號為編者所加。）這裏編者在刪改原話之餘，又罕見地加上了一個省略號。然而該書進行刪改之處大部分都沒有加省略號，也不說明。這個「額外開恩」送給讀者的省略號反映了其編撰體例極不統一。

非常有意思的是，上述〈芒克訪談錄〉中關於這次遊行的回憶（約一頁篇幅），在此文收入到《沉淪的

聖殿》時卻被保留了⑥。雖然《沉淪的聖殿》所收錄的文章也有對內容進行刪除的情況（例如前引北島關於黃翔的回憶和芒克關於「七大民刊」的具體陳述）；但是，比較《沉淪的聖殿》和《持燈》二書所收錄的15篇相同的文章，可以發現有多處「敏感」內容在《沉淪的聖殿》中保存了下來，在《持燈》中卻被砍得七零八落，例如〈北島訪談錄〉、〈芒克訪談錄〉、〈《今天》與我〉、〈十三路沿線〉等文都如此。作為一本十年後在大陸出版的同一方面的編著，其內容之完整性反不如前，這是編者的悲哀，還是大陸出版環境的悲哀？

最可笑的是，《持燈》中所收錄的廖亦武、陳勇所作的對彭剛、芒克、鄂復明等人的六篇訪談，在收入《沉淪的聖殿》和香港版《持燈》時都沿用原名，在收入到大陸版《持燈》時卻被換成「亞縮、陳家坪」這兩個莫名其妙的名字，乍看之下還以為是別人做的別的訪談，核對後才發現是相同的文章——掩耳盜鈴之態莫過於此。

對原話進行刪改不僅會導致信息的殘缺，也有可能誤解作者的原意並誤導讀者。徐曉在〈《今天》與我〉一文中曾經這樣評價《班主任》、《傷痕》等作品：「然而，這些都不過是官方政治框架內的思想解放運動波瀾中的漣漪。與此同時，上層的權力爭鬥引發了關於『兩個凡是』的討論，北京出現了西單民主牆，《北京之春》、《探索》、《四五論壇》等一批政論性民刊應運而生。」⑦在大陸版《持燈》中，這段話被改成了：「然而，這些都不過是

比較《沉淪的聖殿》和《持燈》所收錄的相同文章，可以發現有多處「敏感」內容在《沉淪的聖殿》中保存了下來，在《持燈》中卻被砍得七零八落。作為一本十年後在大陸出版的同一方面的編著，其內容之完整性反不如前，這是編者的悲哀，還是大陸出版環境的悲哀？

在因為外在因素難以維持資料的完整性時，編者至少應該在書中做出統一的標記和說明，以免讀者片面地理解這些殘缺的材料。此外，編者應該說明每篇文章的來源，這樣，編者至少可以充當資料的「中介」或「使者」。

思想解放運動波瀾中的漣漪。與此同時，保守與改革的爭鬥引發了關於『兩個凡是』的討論，北京出現了『西單民主牆』，一批民刊出現。」（頁46）這樣改動不僅刪除了作者對「思想解放運動」和「兩個凡是」爭論的負面看法，同時也曲解了作者對《班主任》等作品的看法：因為把「官方政治框架內的」這個限定語拿掉之後，「思想解放運動」在大陸讀者眼裏一般是個褒義詞，於是整句話看來就變成了對《班主任》等作品的正面評價。而實際情況恰好相反，在徐曉看來，它們只是官方允許範圍之內的小打小鬧而已。

《沉淪的聖殿》對這段話的處理顯得更為謹慎，編者直接把徐曉的第一句話刪除了<sup>⑥</sup>，這樣讀者雖然無法得知徐曉如何評價《班主任》等作品，但至少不會誤以為她讚賞它們——顯然，傳達錯誤信息比不傳達更惡劣。

類似上述這些既無統一規範也無審慎考量的刪改在《持燈》一書中還有很多，這裏不再贅舉。經過這樣「大刀闊斧」的處理之後，香港版《持燈》437頁的規模縮減到大陸版的301頁。雖然香港版《持燈》每頁約560字，大陸版每頁約760字，不過把這個因素考慮在內，大陸版《持燈》的刪節幅度依然很大。當然，在大陸這樣的出版體制下，對涉及政治的內容進行處理是家常便飯的事情，然而編者或出版社編輯在處理這些內容時普遍缺乏規範和統一的原則，遑論慎重的考慮。前面這些刪改有可能並不都是劉禾本人所為，也有可能是出版社編輯的「傑作」，但不管是哪種情況，劉禾

作為該書的第一責任者（編者），無疑要負首要的責任。

劉禾在〈序言〉中明言《持燈》的特點是「強調細節和資料性」（頁V），但如果一個編者想讓其編著不僅是本通俗讀物，同時也希望它對研究者具備價值的話，就應該尊重史料的原貌。在因為外在因素難以維持資料的完整性時，編者至少應該在書中做出統一的標記和說明，以免讀者片面地理解這些殘缺的材料。尤其是在進行刪減時，應統一在刪減處加上省略號，或說明「此處刪去……字」，而且盡量不要改動原話，也不要將一句話內的詞語刪除，或者將幾句話拼貼成一句話，因為這樣同樣會改變原意。

更重要的是，編者應該說明每篇文章的來源，在它們被刪改後尤其應該如此，以便讀者在不足於刪節本時，可以「按圖索驥」地去查找原文，這樣，編者至少可以充當資料的「中介」或「使者」。然而，《持燈》的編者只在〈序言〉中簡略提到《今天》雜誌的「今天舊話」欄目，但並未說明每一篇文章出自何刊何期（頁I-II）。

而且為了宣揚《持燈》一書的資料價值，劉禾居然如此陳述：「接下來齊簡（史保嘉）、鄭先（趙振先）、徐曉、田曉青、崔衛平、一平（李建華）、彭剛等人都給《持燈的使者》寫了文章。」又云：「我讀《持燈》的意外收穫就是結識了像徐曉、崔德英、周郿英、鄂復明，還有趙一凡這一批曾經為《今天》冒險工作，但幾乎被文學史研究遺忘了的人。」（頁II、VIII）這種本末倒置的陳述着實令人驚訝，因為《今天》

只有「今天舊話」欄目，並無「持燈的使者」欄目，《持燈》香港版也只是在2001年才出版並得名，而徐曉等人的文章和訪談早在1990年代就已寫好，並刊載於《今天》、《傾向》等刊物，也收入到了《沉淪的聖殿》中，說他們都在給《持燈》寫文章是否過於專美？

更滑稽的是，劉禾說她讀《持燈》的收穫是結識了徐曉、周郿英等人，那麼這理應是2001年之後的事情，可問題在於周郿英早在1994年便已病逝，不知道劉禾如何在2001年後結識他？或者早在1994年之前就有本《持燈》存在？那麼《持燈》裏有的文章在1999年才寫成，這又如何解釋？作為一個編者，遣詞、敘述如此混亂，讓人如何相信其編著的「細節和資料性」？

## 二

文學史研究的基礎是史料，而史料的完整性與可靠性是研究的前提。當然，有讀者可能會認為：刪去一些政治性內容並不會妨礙我們對文學現象的理解，而劉禾也在《持燈》〈序言〉中明言：「在我看來，言語的反叛大於狹義的政治反叛，因為這類反叛的另一面，即它的烏托邦，直接針對着人們的言說行為和日常生活，而不滿足於對某個抽象的社會理念的訴求。」（頁VI）這個觀點單從邏輯上來看沒甚麼問題，但是它並不符合當時地下詩歌的真實情況，因為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的中國，人的一切言說行為都是官方意識形態體系的一部分，而

言語反叛與政治反叛乃是一體之二面，在當時不存在誰「大於」誰的問題。

詩人多多在談到其早期詩歌的政治性時，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政治只不過是我的存在，那個時代給我的就是政治，沒有別的。」◎《今天》雖然是一個文學刊物，但是其產生的動因卻完全是政治性的，北島回憶到◎：

記得有一次我跟彭剛、芒克喝酒時說過這樣的話「將來有一天中國出現自由化運動，我們一定要站出來為之獻身」……1978年政治上的鬆動終於給了我們一個機會，關鍵是我們能夠做些甚麼。記得那是1978年初秋一個晚上，我和芒克、黃銳在黃銳家的小院裏喝了點兒白酒，我們常在那裏聚會。我提議說，我們應該辦個文學雜誌，現在是時候了。他們立即響應說好，於是說幹就幹。

《今天》屢次組織和參與政治運動，這也是其政治反叛性質的明證。因此，要想理解這個時期的中國地下詩歌，卻把政治、歷史背景抹除是極不妥當的。當然，由於大陸出版審查的因素，編者對內容進行刪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編者不應對史料進行如此「大刀闊斧」的處理和「天衣無縫」的改動，且掩蓋做過刪改這一事實；更不應該在刪改之餘，還宣揚文集的「資料性」，這無疑在給那些不了解情況的讀者添加新的混亂。

筆者之所以對《持燈》的編撰情況如此關注，不僅因為它是大陸出

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的中國，人的一切言說行為都是官方意識形態體系的一部分，而言語反叛與政治反叛乃是一體之二面。要想理解這個時期的中國地下詩歌，卻把政治、歷史背景抹除是極不妥當的。

國內學者若要在中國地下詩歌研究中取得突破，則首先要突破重重障礙，鞏固自身的史料基礎，這些障礙不僅來自官方的硬性約束，也來自研究者和出版界專業素質的匱乏。

版的關於地下詩歌運動的不多的幾本資料集之一，更因為史料的取捨與佔有量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文學史研究的面貌——對「白洋淀」與「今天」詩群的研究尤其如此。目前大陸的研究者大多數仍然很難接觸到這方面的完整的資料（例如刊載於海外的《今天》、《傾向》上的資料），所能倚仗的多為一些被嚴重地「閹割」的資料，以及一些官方主流批評家的討論，到目前為止仍然集中於所謂「朦朧」、「晦澀」之類的論題之上。這些論題既無法深入到歷史語境中去（因為無法接觸到相關的史料，或者接觸到而不能言說），也無法深入到文本中去（因為「朦朧」只是在官方主流詩歌作為參照系考察的結果，實際上「朦朧詩」在現代詩歌體系中算相當淺白的）。因此這些論題往往成為「空對空」式的無聊爭論。

相比之下，頗為諷刺的是，海外學者對中國地下詩歌資料之佔有反而更為豐富，這不僅因為他們能接觸到一些海外出版的刊物，也因為1989年之後流亡海外的異議人士在海外出版了大量關於當代歷史（如關於「民主牆」、「六四」等與當代詩歌密切相關的事件）的著作，因此他們的討論有相當部分是關於當代詩歌的「政治性」或者「中國性」的。當然，這種關注的一個負面後果就是對詩歌之文學性的忽略，甚至把詩歌當作一種社會資料來研究。

筆者無意在此評判兩方面學者研究之優劣，這裏要提出的是，國內學者若要在中國地下詩歌研究中取得突破，則首先要突破重重障礙，鞏固自身的史料基礎，這些障

礙不僅來自官方的硬性約束，也來自研究者和出版界專業素質的匱乏。而海外學者也應該善待自己掌握的資料，在大陸出版編著時，如果不能做一個健全的「使者」，至少要做個誠實的「使者」。

### 註釋

- ① 廖亦武主編：《沉淪的聖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烏魯木齊：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
- ②⑤ 唐曉渡：〈時過境遷話《今天》——芒克訪談錄〉，《傾向：文學人文季刊》，1997年夏季號，頁28-29；31-32。
- ③ 劉洪彬：〈《今天》與民主牆時代（北島談話錄）〉，《民主中國》，1993年第1期，頁81。
- ④ 李潤震：〈「文革」後民刊與新時期詩歌運動〉，《新詩評論》，2006年第1輯，頁98-114。此文所引述之北島致啞默（《啟蒙》成員）信之未刊手稿尤具說服力，可參考。
- ⑥⑧ 廖亦武主編：《沉淪的聖殿》，頁350-51；384。
- ⑦ 徐曉：〈《今天》與我〉，《今天》，1999年春季號，頁28。
- ⑨ 凌越：〈我的大學就是田野——多多訪談錄〉，載多多：《多多詩選》（廣州：花城出版社，2005），頁269。
- ⑩ 田字凌：〈北島和西單民主牆：青春和高壓給予他們可貴的能量（北島訪談錄）〉，《南方都市報》，2008年6月1日。該文完整版〈《今天》的故事——北島訪談錄〉載於《今天》網站，[www.jintian.net/fangtan/2008/nfdsb.html](http://www.jintian.net/fangtan/2008/nfdsb.html)。

李章斌 南京大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心博士